

## 从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看旋风装的形制<sup>\*</sup>

侯 冲

作为中国古代书籍装帧形式,旋风装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形态?旋风装是否有固定形制?由于实物资料有限,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主要原因,与对实物资料的认识有关。

1981年,李致忠先生以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这一实物资料为重要依据,就古书中的“旋风装”这一装帧形式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一方面修正了前人对旋风装的一些不实认识,另一方面则对旋风装的具体形态作了明确的说明:“古书的旋风装,就是在卷轴式的底纸上,将书叶鳞次相错地粘裱,打开时,形似龙鳞,所以称为龙鳞装;收卷时,书叶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称为旋风装,或旋风叶卷子。”<sup>①</sup>因此,他的观点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997年,杜伟生先生根据他在法国、英国藏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一种新的装帧形式,提出“根据文献记载和现存敦煌遗书中的实物来看,将书叶一侧码齐,在纸边涂上浆糊逐叶粘牢,再粘上一根木棍或用一根劈开的竹棍夹住书叶粘连处,打眼穿线装订。展阅时书叶虽参差不齐但排列有序,收藏时以集齐的一侧为轴心卷起,这种装帧就是‘旋风叶’,也就是中国古书旋风装。”他同时指出,故宫藏本《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是龙鳞装,“并不是唐代原来的装帧,而是在崇奢尚靡的宋宣和年间,在皇宫内府中重装的”,“它的原始装帧应该是:所有书叶集齐右侧,逐叶涂少许浆糊将纸边粘牢,加轴(很可能还有一张底纸,在重装时被弃之不用了)。由于书叶很长,所以先对折一下,然后卷起收藏。这才是真正的旋风装。”<sup>②</sup>他的观点提出后,在学术界亦产生了一定影响<sup>③</sup>。

由于对旋风装的定型和形式存在不同说法,2004年,李致忠先生根据现藏

<sup>\*</sup>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 (06@ZH007) 成果。

<sup>①</sup> 李致忠:《古书“旋风装”考辨》,《文物》1981年第2期,第78页。

<sup>②</sup> 杜伟生:《从敦煌遗书的装帧说“旋风装”》,《文献》1997年第3期,第188、189页。

<sup>③</sup> 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40页。

英国的敦煌实物资料,在坚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为旋风装或龙鳞装的同时,提出:“‘龙鳞装’也好,‘旋风装’也好,这只是个名称而已,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上述这些装帧形式是卷轴装向册叶装转变时期的一种过渡形式,它既具有册叶装帧的特点,又未摆脱卷轴装的范式。既不是完全彻底的册叶装,也不是原汁原味的卷轴装。既未完全扬弃卷轴装的全部缺点,也未全部具备册叶装的优长。它只是对卷轴装的一种改进,是册叶装的最初形式。”又说:“(S.5444)这件东西的出现,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旋风装可能是册叶装的前身。”<sup>①</sup>

2006年,张志清、林世田先生根据杜伟生先生提到的S.6349和P.4924写卷,在赞同李致忠先生新观点,又允许旋风装亦名经折装,旋风装就是蝴蝶装(蝶装)这两种观点都有道理的同时,提出:“旋风装不是固定的装帧形制,而是为了携带和翻看的方便,将原有卷子断成数纸,在纸头左端加装木条固定(有的是在卷子中间粘连),再以木条为轴,统一卷起来的装帧形式,是一种偶然的、随意的装订,不能视为一种已经形成规制的装帧形制。但这种偶然的形式中蕴含着必然的因素,就是为满足人们使用和携带的方便;而从卷轴装中隐约出现了册叶装的萌芽,所以它是中国书籍装帧形式过渡的一个例子,不能称为旋风装的固定式样。”<sup>②</sup>

不同的实物证据,虽然都可能与旋风装有关,但研究得出的结果却有如此大的差异,甚至到了否定旋风装有固定形制的地步<sup>③</sup>,主要原因,看来还是缺少更多的足够的实物证据。

2007年11月,笔者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委托,对云南省图书馆等单位拟收入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进行考察。所谓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是指1956年费孝通先生到云南省大理州进行民族调查时,在当时凤仪县(今改为镇)北汤天法藏寺发现的一批大理国时期写经<sup>④</sup>。现分藏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省博物馆和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三个单位。由于此前未看到实物的仅云南省图书馆所藏写本,故以该馆所藏为考察重点。考察中发现了

①李致忠:《敦煌遗书中的装帧形式与书史研究中的装帧形制》,《文献》,2004年第2期,第85、87页。

②张志清、林世田:《S.6439与P.4924〈易三备〉写卷缀合整理研究》,《文献》,2006年第1期,第51页。

③由于认为旋风装没有具体的样式或认为旋风装不是古籍的一种具体形态,所以近年来宋雪梅《“龙鳞装”与“旋风装”考》(《美术观察》2007年第7期)、王传龙《“旋风装”版本汇考》(《大学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3期)、方俊琦《古籍“旋风装”演变探微》(《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均将旋风装与龙鳞装区别开来,对其发展演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④有关凤仪北汤天大理国写经的详细介绍和说明,请参侯冲《大理国写经研究》,载《民族学报》第四辑,民族出版社,2006年,第14-54页。

一批旋风装实物,尽管其中没有一件首尾完整的,但已经增加了几种旋风装的实物资料,而且弄清了什么是旋风叶子及其实际形制,对进一步认识旋风装,确定其固定式样来说,不无裨益。本文先介绍云南省图书馆藏卷的情况,其次说明现藏云南省博物馆的卷轴《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装裱前实为旋风装,最后根据所见并结合时贤研究成果,谈一谈笔者自己对旋风装形制的理解。由于这批旋风装实物已经列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编《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第四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有其图录,限于篇幅,下文行文中提到它们时,仅标出它们在该册中的页码。

## 一、云南省图书馆藏旋风装

### 1.《密教散食仪》(拟名)

大理国(937-1254)写本。存一卷。首尾残缺,全卷有破烂。内容共分三个部分,均属密教行持法会时的启请仪文,未为历代大藏经所收。由于均不完整,相互之间也看不出有内在联系,故仅据文字内容,看不出其先后顺序。有两叶文字最末分别有“国师灌顶大阿左梨王乾德”和“国师阿左梨王德彰书”的题记。由于有“同前”、“息灾触净散食”、“光显启请散食浴像口嘱”等叶目(图一),故拟名《密教散食仪》(第198页)。

此前仅周泳先先生1957年整理时记录过该残卷,认为是“包背装”<sup>①</sup>。实际上是旋风装。有底纸,高29.5厘米,长107厘米。已脱落叶子10馀张,现有叶13张粘接在底纸上。各叶高28.5左右,长度各叶存留不等,自右至左分别为16.7、28、26.8、32.8、45.4、49、49、48.4、28.5、50.7、50.7、49.4、49.4厘米。



图一

①周泳先:《大理国写经目》,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馆藏复写本。

题记是认识叶子先后顺序的关键。南诏大理时期,云南都实行“父子连名制”。但南诏时期的“父子连名制”与大理国时期的“父子连名制”略有差别。南诏时期的父子连名,是没有姓氏的父子连名,即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儿子名字的第一个字,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孙子名字的第一个字,子子孙孙这样递次相连。如南诏王阁罗凤的儿子叫凤伽异,凤伽异的儿子名异牟寻,异牟寻的儿子名寻阁劝,寻阁劝的儿子名劝利晟,等等。而大理国时期则是同姓父子连名制。具体表现是有一个共同的姓氏,但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为儿子名字的第一个字,儿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为孙子名字的第一个字,以下依此类推。如大理国名臣高智升之子名高升泰,孙子名高泰明,重孙为高明生。因此,由“国师灌顶大阿左梨王乾德”和“国师阿左梨王德彰书”二题记的先后顺序,可知王乾德为父,王德彰为子,该文献是大理国写经而不是南诏时期写经,各叶排序是按从右向左的顺序,以纸的左侧为正面。由于每叶粘接在底纸上时,是粘接左边背面,所以内容抄写和阅读是自右至左,收拢时则自左至右卷起<sup>①</sup>。另外,纸的右边即未粘接底纸一边粘有可以写叶目的窄条黄色包纸,高与各叶纸等,长约4厘米。

一般是左面单面写字,但有时也在纸的右面写一些需要添加的内容,从而形成双面写的情况。双面写时,纸的正反两面都有可以写叶目的窄条黄色包纸(第198页下图)。

## 2. 密教启请次第(拟名)

大理国(937-1254)写本。存叶2张。首尾残缺,内容为佚名书汉文与朱笔梵文字母相间的密教法会仪式次第,未见于历代大藏经,兹据内容拟名(第200-201页)。

此2叶装帧形式与下面要提到的《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相同,属旋风装散叶,但纸张大小、书写风格又与《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不同,故属新的旋风装实物。

## 3. 密教观行次第(拟名)

大理国(937-1254)写本。存叶1张。内容为佚名书密教观行次第,未见于历代大藏经,兹据内容拟名(第202页)。装帧形式与前件同,但纸质、纸张大小不同,内容也与其它残叶不相连,为新的旋风装实物。

## 4. 《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

存旋风叶5张。文字自右至左抄写。四张上钤“大理国□□印”(印不全),纸背则有“僧杨义隆造”长方印。由于云南省博物馆现藏大理国保天八年(1136)释照明(俗讳杨义隆)写本《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与此5叶纸高相等,抄写形式和风格相同,抄写内容属于同一类型,并有完整的“大理国督爽

<sup>①</sup>此前由于不辨首尾,先自右至左收卷,到没有粘叶子的底纸部分又自左至右卷起。后来笔者提议从左至右一卷,全卷诸叶顿时井然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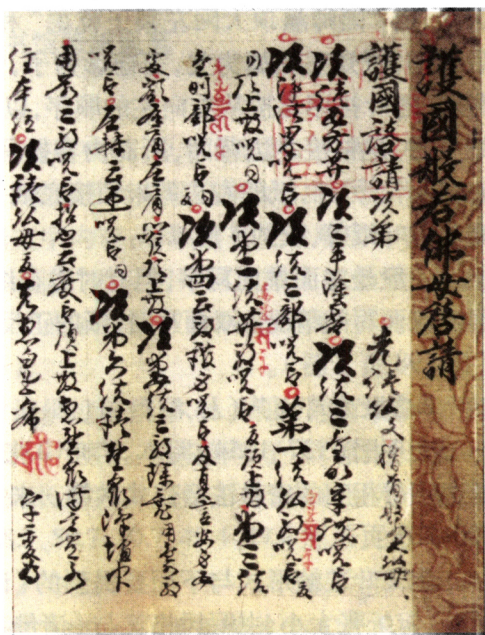


印”铃印,与此5叶上所铃为同一印,故此5叶当与《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为同一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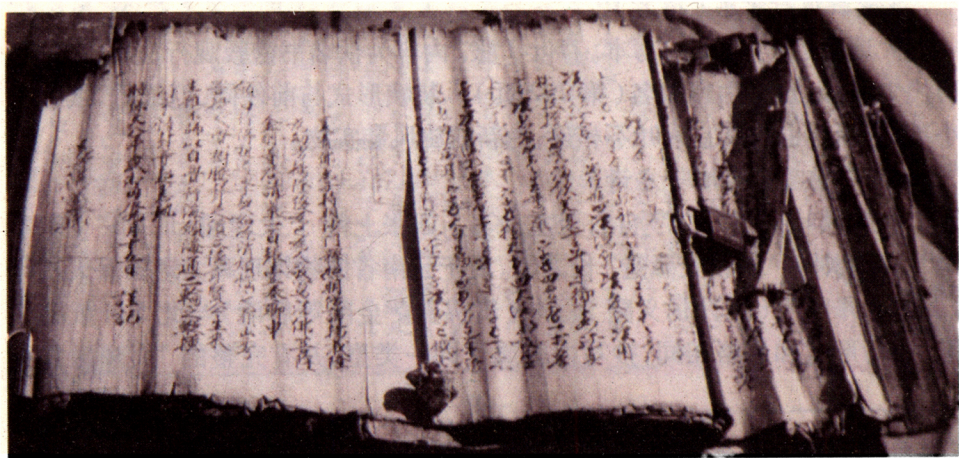
此5叶每叶纸长100厘米,向外对折后左右边错开,左边稍长约0.3厘米,先将右边与左边粘接,再将左边稍长部分背面粘接到底纸上。叶子与底纸粘接处铃“大理国督爽印”(因与底纸脱离,故印文不全),未粘接底纸一侧则以对折线为中心,包一高与叶等、长约4厘米的黄色印花包纸,写有该叶名目(第197页)。虽没有完整的底纸,但仍能看出为旋风装实物。

## 二、云南省博物馆藏改为卷轴的《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

2002年初,承蒙李昆声先生帮助,笔者有幸看到云南省博物馆藏装裱漂亮的大理国写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卷轴,但对其中为什么会有间歇出现并写有叶目的长条黄色印花纸(图二)不解。2004年初,又看到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20世纪50年代拍的该写卷黑白照片(图三),惊叹于最初的残破,现在的漂亮,对装裱师傅们真是打心里表示叹服。不过,看到《密教散食仪》为旋风装,而且纸的右边即未粘接底纸一边粘有可以写叶目的窄条黄色包纸时,笔者就想到了《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中间歇出现并写有叶目的长条黄色印花纸,并推测该



图二



图三

写卷原来也是旋风装,只是后来装裱时才改成了卷轴装。

至少有六条证据证明了笔者的这个推测是成立的:

1.仔细查看上面提到的 20 世纪 50 年代拍的黑白照片,可发现初看是残破的写卷,实际上是叶子。其中叶子右边黄色包纸左侧“同前”、“龔路茶王启请”的叶目尚依稀可见。

2.王冶秋先生见到过该写卷为叶子。20 世纪 60 年代,王冶秋先生曾在云南省博物馆看到过该写卷,在文章中称其“《诸佛菩萨金刚嵇清卷》,有六十六张”<sup>①</sup>。尽管所说叶数略多,但据题名可知所指即此卷,且并非卷轴而是叶子。

3.云南省博物馆记录该藏品原为叶子。在该馆王丽明抄写提供的该写卷的原始记录卡片上,记录的文字为:“藏品号:D 三-27 藏品名称: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仪轨 现状:卷有 30 页,页均有残缺。尺寸:长 2989 厘米,高 25.3 厘米。来源:李家瑞 1966 年参加云南白族自治州调查时征集自凤仪金鑫宝刹。说明:汉文墨书经文,卷面梵文朱书于旁或卷内,并有朱笔圈点。每页背后有‘大理国督爽印’,‘启请’名目均用印花纸书写。备注:1975 年 3 月 12 日此经卷送上海博物馆装裱。”说明原来共有 30 页,并非卷轴,是 1975 年才装裱成卷轴。

4.云南省图书馆保存的旋风装 5 叶。这 5 叶纸的大小、抄写形式、抄写风格,可以看出它们与云南省博物馆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为同一书。由于这 5 叶未曾装裱过,又为旋风装,故可推知《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未装裱前为旋风装。

5.写卷上的题记(图三、图四)。题记称僧人杨义隆“为己为人,敬写诸佛



图四

①冶秋:《大理访古记》,《文物》1961 年第 8 期,第 57 页。



菩萨金刚等启请叶一百张壹卷”，清楚说明当时杨义隆写了一卷，共 100 叶，原初是旋风叶子。附带说一下，题记明确记述所写的叶子数，又说是一卷，既说明旋风装为卷轴装的改进，虽有不少叶，但收起时仍合为一卷，又清楚表明云南这批旋风装当时抄写时就称叶，因此该卷就是古代文献中提到的旋风叶或旋风叶子。以此之故，这条题记非常重要。

6. 写卷题记前不完整的钤印。上面提到，云南省图书馆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的 5 叶旋风装中，4 叶上面有“大理国督爽印”的不完整钤印，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写卷题记前（图三、图四）。从钤印右下的粘接脱落痕迹可以看出，由于这里已脱落 1 叶，才造成这个钤印不完整。而图三中邻近的叶尽管有几处已与底纸脱离，但有近一半的地方仍然粘连在有题记的这叶纸上，故钤印保存得就比较完整<sup>①</sup>。据此亦可以看出，卷末题记所在的纸，就是该件旋风装的底纸。由于题记所在为卷尾，装裱成卷轴后并未改变其最初形态，故旋风叶子粘在底纸上的形式及旋风装卷尾的样式，据此亦可略窥一斑。

### 三、旋风装形制之我见

根据凤仪北汤天写经中的这批旋风装写卷，结合《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卷末题记及前贤相关研究著述，笔者以为有如下几点可以大致确定：

1. 凤仪北汤天写经中装帧形式相同的这批旋风装实物，根据《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卷末“敬写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叶一百张壹卷”的题记，可以确知就是宋代以来文献记载中提到的旋风叶。由于有底纸，可以自左向右即从尾向首卷成一卷，故即使有叶一百张，仍称为“壹卷”。打开时是一叶一叶翻看，翻看到卷尾后，从左向右一卷，即可合为一卷。叶子鳞次相错地粘在底纸上，打开时，形似龙鳞，所以称为龙鳞装；收卷时书叶右边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所以又可称为旋风装，或旋风叶卷子。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旋风叶或旋风叶卷子，目前可以说有了确切的实物资料或定型的形式。就这一点来说，李致忠先生最初提出的观点已经比较符合。略有不同的是，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因为是从右向左卷即从头向尾卷成一卷，所以打开与收卷的次第与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中的旋风装刚好相反（参见第 198 页下图），也恰与“逐叶翻看，展转至末，仍合为一卷”不符，说明它确实已经不是旋风装原来的装帧。

2. 叶子分单面写和双面写两种。就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来看，单面写的情况稍多。单面写的叶子，一叶已经足称为叶或叶子；如果是几叶甚至只是两叶从底纸上一同脱落，都往往会撕脱一层薄薄的底纸，使得它们看上去像半页很长的大型经折装，从而可能是经折装的最初形式；如果是几叶一同脱落，它们重迭在一起，又与册子比较接近。这应该是后人将旋风装与经折装相混，又与册子相混的原因。附带指出的是，宋人欧阳修《归田录》卷二称“唐人藏书，皆

<sup>①</sup>比较照片可以看出，刚发现时，钤印比较完整；改装为卷轴后，钤印已略有错位。

作卷轴,其后有叶子,其制似今策子”<sup>①</sup>,这里所说策子,就是经折装,则这段文字一方面说明旋风装为卷轴装的演变,另一方面也表明,旋风装应是卷轴装发展为经折装的过渡形式之一。

3. 旋风叶确实比卷轴装便于翻检。凤仪北汤天写经中的旋风叶使用了便于查检的叶目,突出了其便于翻检的功能。至于旋风装使用的范围,由于这批写经实物的发现而显得相当广阔,换句话说,它适用于与翻检有关的所有领域,而不仅仅是像《切韵》一类的工具书。附带指出的是,故宫博物院藏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因为已经不是原始装帧,收卷时是从右向左卷即从头向尾卷成一卷,使用起来已经很不方便。

4. 旋风装这种形制出现的原因,最初有可能与佛经注疏有关系。笔者看到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中的《灌顶药师经疏》(第179-180页)、《仁王护国般若波罗密经抄》(拟名)、《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疏》(拟名),在卷轴中粘有不少注疏佛经的浮签,内容较多的浮签粘接在经卷上的方式,与旋风装叶子粘接在底纸上如出一辙。内容较多浮签鳞次粘在一起的样式,与旋风装也非常相似。尤其是《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疏》(拟名)卷首的注疏合叶(第186页),完全就是几个叶子粘接在一起的册叶。从这一实例来看,旋风装如李致忠先生所说,还可能是册叶的前身。上文提到的几张旋风叶子一同脱落后重迭在一起与册子比较接近,亦能证明这一点。

5. 旋风叶流行的时期,是从唐末五代直到宋代。凤仪北汤天写经中的这批旋风叶,均为大理国时期遗物,说明在我国西南边疆,至少大理国时期(大致相当于宋代)仍然流行旋风装。而且时间下限不晚于大理国保天八年(1136)。因此之故,故宫博物院唐写本《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即使为宋宣和年间的装帧,仍属于旋风叶子流行时期的故物。宋人记载旋风叶“人家往往有之”,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旋风装宋代仍然流行的事实。由于有较长的流行时期,故旋风装在书史上并非昙花一现。

6. 旋风装对造纸和接纸技术都有相当高的要求。从凤仪北汤天写经来看,一方面,单纸长超过100厘米的写经并不少见,像分藏云南省社科院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的《护国司南抄》,有四纸的长度均超过130厘米,有一纸甚至长达132.1厘米,表明大理国时期云南造纸技术已经较为高超;另一方面,纸与纸之间相粘合部分,一般不足0.3厘米,旋风叶与底纸的粘合部分,一般也不超过0.3厘米,表明接纸的技术已达到一定高度。与故宫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出自皇宫内府一样,这些大理写经由于出自“国师灌顶大阿左梨”、“国师大阿左梨”或“督爽”(相当于宰相)之手,属于官造之物,故能保证工匠拥有高超的造纸和接纸技术,完成旋风装的装帧。正是由于对技术含量要求较高,所以清人称旋风叶子“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并非凿空之词。

<sup>①</sup>欧阳修:《归田录》(李伟国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第31页。



7. 类似英藏、法藏敦煌遗书中《易三备》的装帧形式,不能认为就是旋风装。旋风装是卷轴装的改进,所以云南省博物馆藏《诸佛菩萨金刚等启请》不经意间就被还原为卷轴装,但类似《易三备》那样为了携带和翻看方便,将原有卷子断成数纸,在对齐的纸头一端加装木条或订线的改进,虽在自左向右的收卷方式上,与我们上文所说旋风装相同,但装帧上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由于其装订带有极强的偶然性和随意性,所以并非一种已经形成规制的装帧形式,很难想象会被写进史志资料中,并让清人称“其装潢皆非今人所晓”。至于以这种装订简单易行、不需要很高装裱技术作为宋代“人家往往有之”的理由,无疑是只按照现在的装裱技术去衡量古人。同样,根据这种有较大偶然性和随意性的不是旋风装的装帧形态,否定旋风装有固定形制,认为旋风装不是古籍的具体形态,不同于龙鳞装,也是欠妥的。

#### 四、小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旋风装可能是佛经注疏过程中在卷轴装基础上出现的一种装帧形式。尽管它可能是卷轴装发展为经折装的过渡形式之一,亦可能是卷轴装发展为册叶的过渡形式之一,但它也是中国书史上有固定形制并曾经长期流行的一种装帧形式。从凤仪北汤天大理写经中的这批旋风装实物来看,旋风装在改进卷轴装后,有其固定的叶子形制和底纸。各叶排序是按从右向左的顺序。但粘接在底纸上的方式与故宫博物院藏《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适相反,不是粘右边而是粘左边。

双面写的叶子,内容抄写和阅读是自右至左,先把第1叶的左边背面粘接在底纸上,再把第2叶的左边背面粘接在第1页左边底纸上,又把第3页的左边背面粘接在第2叶左边的底纸上,再用同样方法,依次把所有叶的左边背面粘接在前一叶左边的底纸上。右边即未粘接底纸一边一般都粘有可以写叶目的窄条包纸,高与各叶纸等。

单面写的叶子,一般纸较长(往往不短于100厘米),向外对折后左右边错开,左边稍长,先将右边与左边粘接,再将左边稍长部分的背面粘接到底纸上。粘接的方式与双面写叶子相同。叶子与底纸粘接处一般有押缝印。未粘接底纸一侧则以对折线为中心,包一高与叶等的窄条包纸。在叶子上抄写文字按自右向左的顺序,抄写时包纸上不写字,待抄写完后再根据内容写上该页叶目,以便翻检。

由于是自左向右依次把左边背面粘接在底纸上,所以收拢卷起时是自左向右卷起。如果技术过关,粘接牢固不脱叶的话,易于检寻翻阅,较卷轴装使用方便。尤其是其叶子错开后写在窄条包纸上的叶目,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较强的实用性。因此它曾经流行于唐宋时期,并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国际儒学院